一

早 年 记 忆

家世和童年

1909 年（清代宣统元年） 8月 26 日（农历七月十三日），我出生在湖南醴陵北乡一个农民家庭中，那时，我家借住在北乡严家冲的“耿氏家祠”里。 宗亲们之所以让我们住在祠堂里，是因为我家穷得地无一垄，房无一间。所以，借住祠堂带有“救济”的性质。借住的条件是：为祠堂洒扫、维修房屋和照顾香火。

中过举人的曾祖父“学而优”却未“仕”，所以他去世后没有遗产留给后人。我的祖父由于家境清贫而沦落为一个游方郎中，他的弟弟则混迹于梨园，进入了旧社会被蔑称为，“下九流”的行列。祖父开始时在一家中药铺当学徒、店员，天天“拉药橱”，只有

饭吃，没有工资，养不活家里人。因此，只好自己背起药箱，走街串巷，当起游方郎中。但是，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后来他中年丧偶，无力续弦，只得抛下幼子弱女，背起一根纤绳，浪迹天涯，从此再无音讯。

祖父留给我父亲的，仅是几本《汤头歌》、《药性赋》的书本和挥手而去的勇气。于是，父亲与比自己仅仅年长三岁的姐姐相依为命，从“诸药赋性，此类最寒；犀角解乎心热，羚羊清乎肺肝……”的药物学中学会了认字，在东讨西乞的苦难中长成了身体，在放牛做田的劳动中认识了社会。他到处去打零工，当小工，靠卖力气挣几个小钱，勉强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后来抱着“艺多养家”的信念和凭双手吃饭的志气，先后学会了木匠、铁匠、瓦匠、医术。到株萍铁路做工时，他已经是个挺熟的泥瓦匠了。

株萍铁路的责任工程师是德国人鲁道夫·麦利克。他很快就发现，这个谈吐不凡的泥瓦匠非同一般，便让他做个助手，帮助浇铸渌江大桥的桥墩。引桥还没有竣工，我父亲已经能够看懂图纸上那些条条、块块、框框等工艺符号了。

尽管麦利克常常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能干，可是父亲的境遇并不见好转。他的收入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直到四十来岁才得以成家，过着“泥瓦匠，没住房”的生活。后来，我们兄弟四人和两个妹

妹相继出生，父亲的负担不断加重。到我五弟出生后，父亲实在无力养活他，不得不忍痛将他送给别人，以保其生存。

我是长子，因此，在兄弟姊妹中，最先感受到父母的艰辛，也最先分担起父亲肩上的重担。

我从小就参加劳动。我是在砍柴、放牛、拣稻穗、挖野菜的时光中认识了故乡的。

父亲并不希望我的童年都在干活中度过，他希望我读书识字，将来能做一番事业。在我六岁那年，父亲白天外出做泥瓦匠，晚上回家干木匠活，竭力供我读了两年私塾。

清末民初的军阀混战，兵匪并扰，使我的家乡陷入了空前的水深火热之中。山民们朝慰官军，暮饷大王，日易三帜。壮男躲丁， 少妇被掳，户主避税……乡亲们不堪其苦，纷纷外逃。1916 年，即民国五年，父亲决定全家向常宁县水口山逃荒。

母亲曾极力反对这一决定。这个饱受苦难的农家妇女，对离乡背井有着由衷的恐惧。她出生在湘潭县淦田的一个铁匠世家。

也许是由于外婆早年辗转流徙的悲惨境遇，也许是由于母亲自己安于现状的传统心理，总之，她不愿意离家逃荒。

在我们的坚持下，母亲最终放弃了她的意见。

1916 年农历二月初二，在母亲选定的黄道吉日，我们收拾了一担破衣旧絮，将粗重杂物接济了乡邻，离开祠堂，加入了官道上逃荒的行列。

衡阳地区常宁县水口山一带，是我国重要的铅锌矿产地。由于这里最早发现的是银矿，所以人们习惯称这里为“银矿局”。我们一家人随着人流来到这里。在一个高大的铁架前，找到了堂舅父宋乔生。他是吊车司机。从此，我们便住在堂舅家。

说是家，其实就是一个四角落地的草棚子，和我们一起住的，还有另一个舅舅宋玉生。不久，我们又把外婆从家乡接来。

舅父们凑了点钱，到江边的松柏镇上买了礼物送给工头，给父亲领到了工牌。当时银矿局正由土法开采向西法开采过渡，需要增加些建筑物，父亲还是干他的本行——泥瓦匠。

我们住的地方叫“半边街”，这是一长溜依山搭起的草棚、泥屋、石窠。当时，水口山有一首歌谣唱道：

十七、十八学做窿，
二十七八逞英雄，
三十七八咬牙过，
四十七八背竹筒。

这就是矿工们一生的真实写照。

其实，能熬到背竹筒（讨米）的人并不多。许多窿工由于铅中毒、生了窿哈病（矽肺），干不了几年就被把头收掉工牌，一脚踢出矿山。再加上使用“牛喝水”式的无勘探开采，哪里有矿哪里挖，整个矿层支离破碎，塌方、泛水、窿火（主要是用火药爆炸矿床时引起的灾害），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半边街上的棚户里，孤儿寡妇的哭声从来就没有断过，老鸦乱葬岗上的乌鸦，吃死人肉都吃红了眼，大白天就飞到选矿场上空聒噪。

矿工们的悲惨遭遇，使他们开展了多次自发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一次一次地遭到镇压，但是，反抗的怒火在继续燃烧，斗争的力量在不断产生、流动、聚集。1921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水口山的工人斗争，从自发斗争逐渐变为有领导的斗争。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指示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到水口山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带来了《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入门》、《俄国革命纪实）等革命书刊，向工人讲解革命道理，并开展组织工作。

乔生舅舅是个性格刚强、嫉恶如仇的人， 每次工人斗争总是少不了他。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

革命道理后，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1922 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在我家来到半边街居住的五年中，虽然我还是一个少年，却亲眼看到了工人们的苦难和他们斗争时的英勇，看到了压迫者、剥削者的残暴和奸诈。特别是我和乔生舅舅朝夕相处，他的言行不断地感染着我，使我逐渐懂得了爱谁、恨谁；也可以说，我不知不觉地从他那里接受了早期的革命教育。

长沙来了委员

1922 年，我已十三岁。我家已是七口之家。作为长子，我必须帮助父亲养家糊口了。趁过年的机会，父亲给选矿科的工头们送了礼，交了保金，替我租了一柄三磅重的敲砂锤，从此我当了敲砂童工。

我得每天摸黑起床，赶在上工喊子拉响之前到场领牌。如果走晚了领不到工牌，一天就没有工做了。为了赶定额，连午饭都顾不上回家吃。那时我家已经搬到枫树塘住，离敲砂场有两里多路，所以，每顿午饭都由我的二弟替我送到敲砂场。

那些从地底下开采上来的石头，经过我们的分选，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元，可是我们每月只挣一元多钱。工头、师爷们每天拿着竹篾，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觉得哪个童工不顺眼，便没头没脑地抽打一顿。

被打的童工疼得满地翻滚，哭爹喊娘。

一天快下班的时候，敲砂小工友刘亚球突然找到我，悄悄地说：

“耿飚，快去找你舅舅，我哥哥叫他到水泵房去。,,

他的哥哥刘东生，是乔生舅舅的朋友。我问道：“到水泵房干什么？”

“你就说，有人请他去吃豆腐。”

过了几天，刘亚球又让我告诉舅舅，到水泵房去，但是这次不是去“吃豆腐”，而是去“搓骨牌”。

每次“吃豆腐” 或 “搓骨牌”回来，乔生舅舅的脸上就泛着红光，好像有了什么喜事。要不就关上门和我们一家人说话。有一次，他对我父亲说：

“南哥，说说矿上不合理的事。”

“不发现洋发矿票，这就不合理。”父亲的矿票是矿局印发，仅限在局内流通的一种代用券。“饷银本来就少，再拿了矿票去买他们的货，又被刮个二三成。”

母亲提起一个米袋说：“局里的米店，买一斗给不满八升，还掺了沙子。”

“对”,舅舅说“:这就叫剥削。’他把母亲说的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又低声地说：“上头已经来人查问了。”

“嗐！有啥子用？”母亲叹口气说。

“不，这次来的人是我们工人的自家人。”

“哪个!”

“长沙来的委员哩。”

我对这位神秘的委员产生了兴趣。当刘亚球再让我送信时我便盯住舅舅，闹着要跟去看看。

“那好，你在火车坪这边放哨。有人来，你就说一声：‘喂！这里有蛐蛐！’”

“那委员——什么样啊？他是谁？”我一再追问。

“就是毛润之先生。”看来舅舅对我完全信任了。

于是，每次舅舅他们开会，我就在火车坪这边放哨，负责监视老鸦方向的则是刘亚球。

那时，经常听到关于毛泽东同志来到水口山的消息，说他调查了工人生活状况。在这前后，毛泽东同志还多次指示中共衡阳地下组织和湘南学联应以水口山为重点，深入工人群众，加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工人懂得了什么叫剥削，从而理直气壮地不断提出经济斗争的要求。

由于采用了西法开采，矿山收入大增。但矿当局不但不给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反而变本加厉地驱使工人卖命，大肆贪污红响，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矿工们纷纷说，“不反不行了！” 1922 年 11 月的一天，乔生舅舅叫上我，到火车坪去欢迎“萍乡来

的先生”。

小火车高鸣着汽笛停下来，刘亚球的哥哥刘东生，陪着几位先生走下火车。刘东生向舅舅他们介绍说：

“这位就是蒋先云同志，这位是谢怀德同志。”

他们受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委托，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名义，到水口山来传授安源煤矿工人运动的经验，组织水口山矿的工人运动。

当天晚上，几百名工人集合在康家戏台前面的坪地上，热烈欢迎他们。乔生舅舅、父亲和我都参加了。欢迎会上，蒋先云发表了演说，他讲了工人们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根源；指出工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才能免受压迫和剥削。他还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团结斗争。他说：组织起来的第一步，是成立工人俱乐部；有了俱乐部，我们工人就有了靠山。他讲得通俗易懂，还不时运用比喻，如用“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不易折断”来说明工人团结就有力量。许多工人不住地点头，有的听着听着，竟流出了眼泪。我觉得他讲的许多道理，以前都没有听到过，经他一讲，脑袋开了窍。

在刚刚建立的党小组的领导下，第二天就成立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筹备处。

两天中，全矿三千多工人踊跃报名加入工人俱乐

部。11 月 27 日，“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三千多名工人手里举着写有“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劳工神圣”的彩色纸旗，参加了在康家戏台举行的成立大会。会上，蒋先云、谢怀德和好几位工人代表都讲了话。

工人俱乐部选出了“十代表”、“百代表”和“总代表”。

乔生舅舅被选为“百代表”和工人纠察股委员。

设立在老鸦一家旅馆里的工人俱乐部，成了全矿工人心目中的圣地。工人有什么要求和建议，就来找俱乐部。

乔生舅舅当过铁匠，这时他又重操旧业，带领工人纠察队连夜赶制梭镖。工人们为应付意外，用这些梭镖进行了应急训练。

那一声喊子

12 月 5 日，震惊中外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爆发了。机器全停、窿口静寂，一份《罢工宣言》发出了工人的心声：

“米也贵了，布也贵了，百物都贵了。只有我们的工钱，还是照从前一样……我们要救命，不得不罢工！”

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改善工人的待遇和争取工

人的权利，工人俱乐部还向矿局提出了“须承认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全体工人的全权；增加工资，每年加薪一次，并发红利；每逢星期日休假一天不扣薪，因工丧命者给抚恤金，受伤者给养老金；婚姻、丧葬、病假照常给薪；采用八小时工作制；矿局每月须补贴俱乐部常用二百元及俱乐部建筑部址津贴费一千元，并须判给公地三十并，如部址建筑未竣， 矿局必须给公屋一座”等十八项条件。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和北京总部及时发出了通告，要求全国各工团声援水口山这一活动。毛泽东同志直接出面与赵恒惕本人对话，为这一行动争得了法律上的承认。矿局局长赵铭鼎被迫辞职。新任局长刘世涛按照赵恒惕的旨意，采用缓兵之计，要求工人先开工抽水，以免淹窿废矿。他们甚至使用酒肉拉拢，以为韬晦之计。

当这一切都遭失败之后，反动派终于孤注一掷。赵铭鼎重新粉墨登场。 12 月 18 日，一个炮兵连唱着反动派军歌开进水口山。

一张，“请柬”送到了俱乐部，指名要蒋先云前往“磋商”。

消息立刻传遍了矿山。我父亲仅用三个字就道出了其中的真谛：

“鸿门宴”。

我们这些小通信员们把脚板甩得啪啪响，从各个地方把工人代表和党员们召回俱乐部。实际上，这次骨干会并没有按预定的范围进行，有闻讯赶来的工人，还夹杂着一些獐头鼠目的“癞子”。在会上，蒋先云斩钉截铁地拍案决定：

“我去!”

乔生舅舅一直让我跟着他，带领纠察队员们，到各处通知十代表、百代表、童工、家属：

“准备好，喊子为号，直扑矿局。”

矿警队已经把老鸦、火车坪、枫树塘、五子的四座木栅门紧紧守住。局本部前后四层大门，各配双枪、马刀、军棍。树丛里的打手，探头探脑，一片杀气腾腾。

蒋先云和刘东生在矿局大门停住，转身向工友们挥挥手，蒋先云整一整长衫的领扣，大步向岗哨林立的甬路上走去，刘东生跟在后面。

我们虽然爬到了矿局门前的大树上，可是仍然看不见他们两人到底进了那个房间。也没见赵铭鼎、刘世涛等坏头头们进局。这时才真正担心起来。突然，局里一声哨子，十几名矿警从房后边冲出来，涌进了招待室。看到样子不对，围在门口的工人立即大声呼喊起来：

“把我们的代表放出来！”

显然，矿局正在用武力威胁我们的代表。我的心跳得厉害，只是和刘亚球使劲地摇树枝，一声一声地喊“放出来!放出来！”

这时，我盼望的那一声喊子，响了！

“吼一吼一吼一”那声音，像是从整个地底下冲上来的，憋足了劲，直往我的心里钻。现在，几十年过去了，那一声喊子还在我的心里回响。

火车坪上停着一台机车，也拉响了汽笛。三千多名工友“啊！啊！”地与喊子呼应着，洪水般蜂拥而来，一下子把矿局围成了一座孤岛。我和刘亚球从树上跳下来，汇进了这股洪流里去。第二道封锁线已经被我们冲开了。这时我发现父亲带着几个徒弟，手里拿着瓦刀，在人群中大喊着：“官逼民反啊！”团团围住矿局。正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报道的那样：形成一个“钢铁桶子”。

“反对阴谋杀害我们的全权代表！”

“放出总代表!”

“不答应条件誓不复工！”

“延长一点钟就增加一个条件！”

“不放出我们的代表，就烧毁矿局！”

这时，一大队矿警， 约有一百多名，奉命赶来镇压。谢怀德从怀里“刷” 地抽出一把明晃晃的马刀，

大声怒吼：

“你们来干什么？快回去，否则，我们工人不讲客气！”

大家一齐喊“滚回去！滚回去！

在“吼一吼一吼一”的汽笛声中，在一阵阵“烧毁矿局”、“誓不复工”、“停泵淹窿”的愤怒声浪中，在“杀一个蒋先云，还有三千个蒋先云！”“杀一个刘东生，还有三千个刘东生！”（这是蒋、刘两位面对敌人“不开工就立即正法”的威胁而发出的豪言壮语）的凛然正气下，赵铭鼎之流吓破了狗胆，乖乖地放出了蒋先云和刘东生。

我们簇拥着总代表，凯旋俱乐部。在敲砂场前的土坡上，蒋先云再次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诡计：

“这些官僚资本家今天不是要我们去谈判的，是想搞诡计，杀一儆百的。现在放了我们，也是出于无奈，他们又想玩花招。但是，我们全体工友只要团结起来，反动派最后终要垮台！”

第二天，水口山三千工人发出快邮电，揭露反动当局的阴谋，激起了全国各工团、法团和新闻界的声讨巨浪。

赵铭鼎、刘世涛一伙，在这次妄图杀害总代表的阴谋败露后，又妄图“失火钻床底”，先救外商亟待装船要矿砂的燃眉之急。他们指使选矿科长潘振纲火

速强迫童工敲砂，以图解脱内外交困的处境。

潘振纲气急败坏地来到敲砂场，大声地咒骂着：

“你们这些臭麻蝈（当时对敲砂童工的称呼），立刻开工，每人敲一担砂，敲不完我抽你们的骨头！”

他以为我们这些童工，最大的弱点是怕吓唬。他又想错了。罢工半个月以来，我们在俱乐部的教育下，已经成为坚强的小工人。面对着潘振纲的威胁，大家纷纷喊起来：

“不答应条件，就不敲砂！”

“潘癞子，潘癞子，当狗腿，流坏水。”

附近的几个武装矿警闻讯赶来，一见这阵势，向我们伸出了枪口。

潘振纲有了帮手，得意忘形：“政府有令，闹工潮格杀勿论！”他从腰里拔出手枪，哗啦哗啦地拉拉枪栓：“谁敢违抗，立刻枪毙！”

他话还没有说完，猛地那一声喊子又在耳边响起，我浑身的力量都聚到喉咙上了， 就尖声喊起来：

“哇——”

几百个“敲砂麻蝈”同时“哇——”起来。

在那些日子里，工人俱乐部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圣地。在老鸦俱乐部那间堂屋里，挂满了全国各地工人、学生、民主革命团体发出的声援电。除此而外，还有经济上的支援。人们谈论着：

“听说没有？连列宁都知道我们罢工了，发电报来了。”当时曾流传列宁发电报支持水口山工人罢工的消息。

“列宁是哪个？”

“列先生比长沙的毛委员还大？”

“嘘！还有，赵胡子再犯牛劲，全国工人都要……,,

“哪样？”

“‘吼一吼一吼一’明白了？”

“噢。”

赵铭鼎、刘世涛一伙终于黔驴技穷了。12 月 25 日，他们被迫无条件接受工人要求。26 日下午，十八条要求得到签字认可。

水口山矿有史以来的盛大节日到了！27 日上午，三千多工人兴高采烈，高举“劳工神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万岁’，等标语，在老鸦洋炮厂前集合，举行了大游行。我们把一张张油印的《上工宣言》，沿途分送给每一位工人：

“胜利了！胜利了！气也出来了！命也可以救了！我们宣布上工。”

“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但是我们这次罢工所取得的胜利，只算是胜利的第一次……我们还要取得第二次，第三次……”

许多工人一面游行，一面高兴地振臂呼喊：

“工人万岁!”

“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

洗砂台上

在水口山罢工胜利的鼓舞下，松柏镇的砂船工人、运输工人也相继成立了工会，与反动派展开了斗争。1923 年 3 月，中共湘区委员会又派贺恕、唐际华、毛泽覃来到水口山，他们带来了二七大罢工之后，党要求全国工人阶级“弯弓待发”的指示，成立了中共水口山支部。5 月，夏曦同志又来水口山，主持建立了水口山党团（相当于党委）。

工人夜校在新盖的两层楼校舍开课了。我们这些从来也没想过能进“洋学堂”的工人也有了上学的机会。按工人要求建起的学校，不但有新教室，还有宽阔的操场和体育设施。我记得上政治课的是校长蒋先云同志，上文化课教国语的是朱舜华同志。朱老师爱穿月白学生衫、黑裙子，她上第一课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她这样讲解“工人”两个字：

“看！这就是‘工’,它顶天立地;‘工’和‘人’加起来，就是‘天’……”

毛泽覃同志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显得文静而